

# 论循证治理视域下新时代治理格局创新

林宇晖, 刘爱莲

(河海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 南京 211100)

**摘要:** 循证治理是多元治理主体基于严谨、科学的方法形成研究证据, 利用证据进行治理。新时代社会治理格局强调共建主体的多元化、共治过程的专业化以及共享结果的公正性。这一治理格局不仅需要具有广泛共识的价值理性, 还需要行之有效的技术理性。循证作为治理领域的技术要素, 要求治理主体从对个体经验的绝对依附转向对证据的甄别和使用, 这是引导多元主体理性共建的客观需要; 主张循证的权责对应性和证据自身的公正性, 是规范共治过程有序高效的基本要求; 强调治理成果共享中技术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辩证统一, 是满足治理成果科学共享的理性诉求。

**关键词:** 新时代; 社会治理; 循证治理

**中图分类号:** D523 - 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 - 579(2019) 02 - 0026 - 07

## On the Innovation of Governance Pattern in the New Er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vidence - based Governance

LIN Yuhui, LIU Ailian

(School of Marxism, Hohai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1100, China)

**Abstract:** Evidence - based governance is the governing method that the multiple governance subject uses evidences to govern, based on the evidences from rigorous and scientific approaches. The social governance pattern of the new era emphasizes the diversification of the co - construction subjects, the specialization of the co - governance process and the fairness of sharing the results. This governance pattern not only needs the value rationality with broad consensus, but also needs the effective technical rationality. Evidence - based, as a technical element in the field of governance, requires the subject of governance to shift from absolute attachment to individual experience to the screening and use of evidence, which is the objective need to guide the rational co - construction of multiple subjects; advocating evidence - based correspondence and the fairness of evidence itself is the basic requirement to standardize the orderly and efficient process of co - governance; emphasizing the dialectical unity of technical rationality and value rationality in the sharing of governance results is a rational appeal to meet the scientific sharing of governance results.

**Key words:** new era; social governance; evidence - based governance

收稿日期: 2018 - 12 - 20

基金项目: 教育部高校示范马克思主义学院和优秀教学科研团队建设项目“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能力研究”(编号: 17JDSZK019); 河海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暨江苏省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计划项目“我国共享发展理念的生成逻辑与实现理路研究”(编号: 2017B740X14)

作者简介: 林宇晖(1987 - )女, 福建三明人, 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刘爱莲(1957 - )女, 江苏淮安人, 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行政管理。

近年来,循证理念在国际公共管理领域成为政府和学界关注的重要范畴和实践手段。循证管理是指“将建立在最佳证据之上的管理原则转化为组织的管理实践的过程;其使管理决策从基于个人偏好和不系统的经验转变为基于最佳的科学证据”。<sup>[1]</sup>循证治理(evidence-based governance)是由循证管理理念演化而来的治理理念,意指“多元治理主体基于严谨、科学的方法形成研究证据,利用证据进行治理”。<sup>[2]</sup>其核心在于强调治理过程中证据的科学性、客观性、公正性以及实效性。与循证管理不同的是循证治理的主体不再局限于精英群体或权力阶层,证据的充分可及性打破了以往权力阶层因对证据研究和使用的垄断而带来的话语优势。相较于国际研究成果,尤其是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对循证治理的研究而言,国内对该问题的研究成果有如凤毛麟角。新时代下,我国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强调共建主体的多元化、共治过程的专业化以及共享结果的公正性,这从价值层面契合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要义,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享发展理念的主旨。然而治理作为“一种偏重于技术性的政治行为”,<sup>[3] (p76)</sup>多元主体参与的共治并不意味着行之有效的善治,价值层面的引领需要科学合理的配套技术才能得以落实。在新时代下的治理格局中,循证治理是转变多元主体的治理观念,实现社会共治过程的有序高效,形成治理成果的理性共享这一治理格局不可或缺的技术要素和思想要素。

## 一、追求治理证据的客观公正是共建共治的重要前提

新时代治理格局的建构,改变了以往政府一元主导的治理模式,政府、市场、社会组织、民众在不同层级的治理中均成为治理主体,多元主体参与的社会治理既是现代化社会发展利益多元化的需要,也体现了治理权利的民主化、扁平化。然而多元主体的理性共建不仅局限于价值判断的维度,还依附于科学有效的事实判断。治理过程中保证治理证据的客观公正性,为避免治理的经验化和制衡多元主体的话语效力提供事实依据,是实现从“善政”向“善治”转变的科学治理模式。

### (一) 共建共治中注重证据的客观性避免经验化治理

共建共治中注重证据的客观性是避免治理主体过分依赖主观经验判断导致治理失效的现实需要。治理作为社会建设的手段只在公共领域发生的行为活动,涉及公共领域中的每一位个体,因此,新时代社会治理格局是对个体合理利益发言权的保障。在多元主体参与的治理活动中,新生的治理主体,如基层民众、新兴的社会组织,在参与治理的初期难免带有历史的痕迹。传统的中国社会是带有乡土性的,在乡土社会中的社会治理是一种“自我主义”的经验治理和道德治理,社会治理的主体主要是氏族长老、家长,主体的权威来自其个人威望,治理依据主要来自祖训及生活经验。“个人不但可以信任自己的经验,而且同样可以信任若祖若父的经验。”<sup>[4] (p55)</sup>对此,费孝通先生用“差序格局”一词概括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治理结构,“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sup>[4] (p32)</sup>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组织起来”的治理主体被定格在政府、单位和基层街道的体制内。这种政府全能型的管理模式一方面改变了既往社会一盘散沙的状态,自上而下的管理体制以及高度统一的社会规序极大增强了政府的控制力,但同时造成治理体系中政府和社会二分的状态。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社会结构不再局限于私人网络或封闭的单位体制而具有团体格局和公共空间,社会治理的主体也不再局限于小共同体范围内的单个权威,而赋予了社会大众平等的治理权利和义务,单纯依靠个体经验判断和道德规则已无法满足现代化社会的治理要求。在近年来中国社会的转型时期,社会的泛道德化批判和泛政治化批判表现出了社会成员在治理过程中因缺乏有效证据而导致的主观臆断和经验越位等消极影响。面对庞杂、跨域的公共问题,社会关系网产生了本质转变,传统社会中形成的经验和治理方式已然不足以应对信息时代下的社会治理问题。无论是政府对内的控制力还是社会组织对外的治理手段,若不谋求进一步升级,将遇到较为被动、尴尬的局面。

20世纪90年代以来,“治理”一词开始在管理学、政治学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流行起来,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借鉴循证管理的思想,部分学者在社会治理领域提出“循证治理”概念。循证治理的核心在于证据,证据不单纯等于治理对象所体现的表象化事实信

息,而是建立在科学研究基础之上的研究证据,因而循证治理中的证据是对治理对象的客观、科学的反映,具有客观性和科学性。循证治理的客观性在于要求治理主体客观评价治理对象,并依据行之有效的证据提出治理方案,以避免治理主体的主观臆断,为提升治理效度以及治理主体的合法性提供技术支撑。循证治理的科学性在于治理过程中以最佳证据为治理依据。所谓最佳证据是指有效且与治理对象有关的研究证据,这其中包含过往的经验证据,但不完全依赖经验,还需要结合治理对象本身的现实情况加以研究分析。循证基于治理当时的客观事实,凭借科学的研究方法获得证据,在证据形成过程中尽可能避免主观臆断及定势思维的局限,使证据本身以一种中立、客观的状态呈现在治理主体面前,能够被多元化的治理主体承认并使用。

### (二) 共建共治中持守证据的公正性避免治理话语失衡

新时代共建共治的格局中证据的公正性强调了治理过程中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的辩证统一,从而平衡各治理主体在治理过程中凭借科学证据平等实现话语效力。新时代社会治理格局与以往“强政府—弱市场—弱社会”的管理格局不同,多元主体参与的治理模式将形成一种“强政府—强市场—强社会”的治理格局。该治理格局是一种上下互动,追求政府、市场、社会之间良好合作的善治状态,善治的本质特征是还政于民,其根本目的在于公共利益的最大化,该目标关涉治理的公正性。对于公共利益治理的公正性问题,依据罗尔斯的观点,若一个共同体的社会成员都有分享公共利益的意愿,那么每位成员都有权享有同样的一份。但公共利益具有不可分性以及公共性,因此,在治理过程中,一种公正的价值确信,需要在有效的公共规则和治理手段中才能得到落实。“假设公共利益对每一个人都是有利的,并且所有人都同意这种公共利益的安排,那么,从每个人的观点来看,强制手段的使用都是完全合理的。”<sup>[5] (p268)</sup>无论是支撑强制手段的说服力还是计算可能存在的外差因素,都离不开真实的事实证据以及科学的研究证据作为评判依据,从而实现治理的公正性。

在治理主体多元化的格局中,一方面只有各主体的治理效力均等才不至于其他主体的跨界干预而导致的治理主体话语权失衡;另一方面,在治理过程中多元主体的矛盾冲突必然存在,尤其是公利和私利,公权和私权之间的摩擦碰撞,而“治理权威主要源于公民的认同和共识”。<sup>[3] (p23)</sup>因此,要在强政府的背景下实现强市场和强社会等治理主体的话语效力,实现多元利益的有效平衡,具有公正性的证据支撑无疑较易于获得多元主体的认同和共识,从而提升治理主体的话语效力以及公正治理。循证治理中证据的公正性在形式上表现为证据的平等开放性。在治理过程中治理主体对证据的可及性打破了以往循证管理和循证决策中决策者对证据的封闭性或垄断性,从而避免因证据资源垄断带来的话语优势。对于多元的治理主体而言,无论是主体参与的公平性和还是治理过程中的透明性,或者法律、规则、集体协议等外在规约,不仅需要统一的价值判断,还需要科学的事实判断。治理过程中,多元主体的治理权利以及效力在证据面前被平等的对待,不因政治地位、经济收入、文化程度、宗教和政治信仰的差别有所不同。在实质上,治理证据的公正性囊括治理经验、当前事实以及公共理性等要素,在科学证据开放、共享的前提下,为出台治理政策、社会组织的治理方案以及公民参与听证、民主协商等社会共治过程中提供科学的技术支撑。且无论是在社会治理前的协商过程中还是治理后的后效评价,甚至是治理失效的归因分析都尽可能地做到有据可循,以增强治理过程中实现利益最大化的科学性和说服力。

## 二、保障治理过程的有序性是高效共治的新诉求

近年来,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效度以及民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意识均有所提升,但多元主体的民主协商和共治,不同主体的话语交织碰撞并不一定能够带来高效、有序的治理过程。确保治理过程的有序高效在客观上有赖于治理证据的科学实效,在主观上要求治理主体在参与治理过程中对治理权责意识的自觉。

### (一) 共治过程中治理证据充分是客观要件

新时代社会治理格局在治理过程中强调了政府、市场和社会等多元主体的有序共治,以解决治理主体一元化带来的治理失效问题。多元主体在性质、功能和治理手段上各有不同,协同共治能够迎合社会

发展的具体需要以及个性化建设,但有序共治的前提是利益分配的可调和性以及联合共治的可持续性。新时代下,无论是社会个体的交往情况还是信息的传播相较于以往都要更为复杂、频繁得多。社会发展的各领域各群体都可以从自身角度提出合理的诉求,但也存在与公共利益相悖的可能,面对日益复杂化的利益诉求,如何在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现状下实现公共利益的合理分配,需要我们在治理过程中厘清普遍与特殊,一般与个别的矛盾关系。

循证治理中证据具有实效性,是在社会共治过程中,实现治理价值的普遍性与治理技术特殊性之间的辩证统一。新的治理体系和社会治理格局的构建从制度层面推进了政府、市场和社会共同参与治理的善治进程,这一过程带有一定价值的普遍性和制度的稳定性。但在落实这一治理制度的过程中,若“没有一个真诚的公众话语,就不要指望满足公众利益且为此付诸行动”。<sup>[6] (p120)</sup>循证治理中证据的实效性,就在于根据不同治理对象的具体情况,了解矛盾背后的“根源性和必然性”,“从它们的特殊意义上来把握它们。……把握特殊对象的特殊逻辑”。<sup>[7] (p359)</sup>证据的实效是因时、因事、因人地把握“特殊对象的特殊逻辑”的结果,从而透过外在的利益表象,论证并尊重客观的事实本质,以支撑治理中公众话语的说服力,实现治理过程中主体与客体,手段与目标的有序对应。

循证治理主张根据证据强度大小甄别证据的实效性,这正契合当前我国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现状下的治理需要。治理中的证据强度是甄别证据实效性,选择治理措施的关键因素。所谓证据强度是指“研究证据接近真实的程度、影响力的大小和在实践中的适用性”。<sup>[8]</sup>该强度分为内部效度(internal validity),即证据自身的质量,根据样本试验研究所得结论的有效性,外部效度(external validity),即样本结论可推及的领域及可行性。因此,社会共治的有序性强调根据治理证据所表现的强度差异针对具体情况进行协作共治,而非绝对、同一的抽象共治。“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sup>[9] (p296)</sup>根据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诠释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同时,治理所面临的又是一个具有高度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信息化社会,各领域发展要素在各区域所呈现的特殊样态具有多样性和易变性,必然要求在全民共治的过程中,结合治理对象的具体情况而形成的客观、科学的研究证据。循证治理主张普遍性、共性的治理经验与特殊性、个体化的研究证据相结合以指导制定治理决策,做到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对“证”治理。

## (二) 高效共治过程中必须遵循符合主体利益诉求的权责对等原则

新时代下,学界在研究治理政策以及治理效度的过程中始终强调了治理主体的权利问题,主张治理权利的下放和扁平化。当治理权利主体由一元拓展到多元,尤其是公众的参与,在治理的结果层面将产生何种状况?克罗齐耶认为,当参与决策的主体多元化且数量大量扩增时,囿于阶层、利益、知识背景等差异,决策过程中的协商,将使决策的时效性和科学性受到折损,“推出一种新的方案,必须进行的活动是如此众多,每一项活动都承载着重负,都蕴含着巨大风险,计划之中的行动的本身的意义因此被大大降低了”。<sup>[10] (p18)</sup>克罗齐耶担忧的一个关键性范畴是权责分配问题。在社会治理中过于强调权利的个体性,将造成私权和公权的混淆以及利益分配上的排他性,因而与治理追求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本质和循证治理的实效性相背离。

事实上,在社会治理层面,治理作为社会公共领域的活动,个体的权利是社会赋予的公共权利,在社会关系中,治理主体的权利是个体性与社会性的统一。在新时代社会治理格局中,治理主体不仅是权利主体还是义务主体,个体的权利自由只有通过义务的自觉履行才能成为真正的自由。“与权利相近,义务具有外在社会性和内在个体性的二重规定。”<sup>[11]</sup>在康德看来,社会中个体既是一种感性的存在,同时也具有理性的特质,社会的法则受个体的理性影响,在理性的自由王国中,个体通过理性立法而实现对义务的承诺。“每一个理性存在者的意志都是一个普遍立法的意志的理念。”<sup>[12] (p439)</sup>理性自由的存在是建立在个体对感性欲求扬弃的基础之上,个体的自由来自个体对自身义务的承诺和自觉。在康德强调义务的社会性的同时,黑格尔还强调了义务的个体性,他认为个体义务是摆脱“自然冲动的依附状态”和“没有规定性的主观性”,而具有自觉意志的行为。

循证治理强调治理过程中多元主体提议权利和循证义务的对等意识,以避免治理过程中的利益冲

突和决策部门的循证负重,是迎合高效共治的主观需要。在以往“强政府—弱市场—弱社会”的管理格局,政府的“强”不仅体现在其权力效力,还因其强大循证团队为政府决策提供研究证据,做出科学决策,从而达到公民对政府决策的共识和认同,以实现政府治理的权威性。如英国首相办公室设立的“行为洞察团队”(Behavioral Insight Team, BIT)和美国的“坎贝尔协同研究中心”(Campbell Collaboration),专门在治理的相关领域为政府决策提供循证咨询和研究证据。

新时代下的社会治理格局,新生治理主体在治理过程中的循证意识是实现高效共治的前提。参照“F市的12345政府公共服务系统”2017年的官方数据分析,<sup>①</sup>民众作为治理的主体,在投诉类及建议类信访件中,举证意识十分薄弱,诸多治理意见、建议的基本信息缺失,因而将基础信息搜集和甄别工作转嫁到政府公务人员一方,造成了多元治理的权利方与一元循证的责任方之间治理权责的不对称,从而形成克罗齐耶对于多元权利主体参与治理造成的负重过载的担忧。民众对公共利益的分配大多停留在单向度的诉求模式,这在本质上并未改变治理主体一元化的状态,其治理程序依然是自上而下的演绎程序,而非自下而上的归纳过程。因此要提高治理效度,不仅在于治理主体的赋权,还在于形成治理的责任意识,治理主体在参与治理的过程中不仅是利益的诉求,还需要有提供真实信息、有效证据的意识,在治理过程中尽可能地提供相关事实证据,为决策部门作为循证参考,将避免流于自由主义的倾向,真正做到“在义务中,个人得到解放而达到了实体性的自由”。<sup>[13] (p186)</sup>

### 三、实现共治成果共享是创新共治格局的根本旨趣

在传统社会管理中,治理所依附的国家理性或经济理性都表现出了不同程度的不足。在新时代的社会治理格局中,共治格局中程序正义在技术层面能够为全民共享治理成果提供专业化的技术理性;在价值层面,治理是发生在公共领域的社会活动,证据的生成及运用过程蕴含着对公共善的建构和普及,是共享治理成果所必须的价值理性。

#### (一) 构建程序正义以作共享治理成果的技术理性

治理成果的公平共享有赖于治理程序的公平正义性。新时代下的社会治理格局致力于公共利益分配的公平性,实现物质成果的公平共享,该格局是由多元主体共治以期达到的社会共享。从共享的社会层面论析,共享社会治理的成果有别于西方国家的公共福利分配具有外在性。社会主义治理格局下的成果共享是内在性的自主生成过程,这一过程从结果和程序两个维度强调治理成果的公平共享性。依据罗尔斯的观点,社会对正义的期望首先在于对社会经济不平等的调节,以达到社会利益的合理分配,而这一期望需要通过一种“纯粹的程序正义”中介才能得以实现。“在纯粹的程序正义中,不存在对正当结果的独立标准,而是存在一种正确的或公平的程序,这种程序若被人们恰当地遵守,其结果也会是正确的或公平的。”<sup>[5] (p86)</sup>当然,罗尔斯所构建的是一种绝对理想化的状态,他排除了程序中的偶然因素以及通过纯粹正义程序所达到的某些特殊结果,但他对程序和结果之间导向关系的观点值得我们借鉴。在治理过程中我们不仅需要有一个衡量治理成果是否得到真正共享的标准,程序作为结果的直接诱因,程序的正当性直接影响治理成果的分配。

成果共享中的循证程序强调了通过规范、正义的治理程序,以实现利益分配的合理性。循证程序表现为确立治理问题,围绕问题搜集相关信息形成研究证据并对治理主体开放,将该研究证据在考虑具体情境的基础上形成最佳决策。这一程序是对客观证据的归纳研究过程,使治理权利落实在同一尺度上。“权利,就它的本性来讲,只在于使用同一尺度。”<sup>[14] (p305)</sup>在高度复杂性和不确定的发展状态中,主体利益和治理证据会因时因事而不断变化更新,但循证程序无需追溯特殊的环境和个人,具有相对普遍性和统一性。循证程序是实现的对个别的治理信息归纳、上升到一般研究证据的过程,以此规范多元主体在运

<sup>①</sup> 数据来源: <http://fz12345.fuzhou.gov.cn/>,截至2017年10月份,F市的诉求总量为270409件,日均量为1000件,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民众具备参与治理的权利和意识。但在日均信访件中75%—85%为投诉案件,建议类信访件仅占3%—5%,咨询类信访件占12%—19%,求助类信访件占1%左右。

用治理权利过程中所依据的标准化治理尺度。同时,循证作为“评判某项社会政策或计划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奏效的‘黄金标准’”,<sup>[15]</sup>循证程序中还要求后效评价,在实际治理中分析、修正相关证据,保持证据强度。治理程序中证据强度越高,治理结果中的偶然性就越小,且证据具有的连贯性和权威性有助于推进治理结果趋向合理的方向。

英国教育基金会(Education Endowment Foundation,简称“EEF”)是在教育领域中通过循证治理实现教育资源公平共享的典型案列。<sup>①</sup>该案例就治理视角而言体现了萨拉蒙的“新治理”理论,即在治理过程中第三方组织的作用。第三方组织在治理程序上能够消解私人利益对治理结果的消极影响,突出技术的优先性。就循证程序而言,教育管理者、教师、学生及其家长均是治理的主体,为该组织提供基础的教育信息供研究人员参考,该组织对教育方案的设计、实践、跟踪反馈和调整都依据规范的循证程序,引导主体依据最新的证据资源做出治理决策,从而使研究成果打破阶层壁垒对各类学校和人群开放。在此基础上做出的决策判断相较于旧有的治理程序而言更趋向于公平,体现了循证程序中通过信息数据和研究证据生成决策,实现治理成果在物质层面的公平共享。

#### (二) 凝聚共识性的善以作共享治理成果的价值理性

社会治理在价值理性层面主张运用公共理性达成对治理的共识,表现为治理过程中共识性的善,这是实现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辩证统一的精神动力。“社会共治注重多元主体相互联动合作,引导社会和公众参与,旨在破除传统‘管理论’单一、强制的威权色彩,逐步提升现代治理过程的民主性和公共性。”<sup>[16]</sup>公共利益关涉社会中的个体,但并非个体利益的简单叠加,公共利益中的个体从个别性看是一个独立个体的存在,从社会的公共性看则是作为社会的分子存在。“因为每一个其他的人也仍然是一个我,当我自己称自己为‘我’时,虽然我无疑地是指这个个别的我自己,但同时我也说出了完全普遍的东西。”<sup>[16](p81)</sup>社会公共利益在物质层面是对个体性和普遍性矛盾关系的协调,在精神层面是价值取向和价值导向辩证统一。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中,共享的意蕴一方面在于物质成果的公平分配,另一方面在于对公共善的构建,形成全民共有的公共理性,这是实现社会治理正当性的精神要素。该要素仅凭治理主体自身的自觉性难以完全跳出私人利益的边界形成共识性的善,作为治理主体,在治理过程中,其公共理性的自觉性有必要通过公共性治理要素的中介,从而逐步趋向共识性的理性状态。

新时代共治格局中证据的生成和运用是基于对公共利益的考量,在尊重社会差异性的治理过程中贯穿对公共善的建构。如前所述,作为治理的主体,要实现理性治理,客观上需要权威证据的支撑,主观上需要以公共性的视角做出治理决策。循证治理的核心在于证据,作为治理的证据不是一种强制性的存在,治理中最佳证据来源于个体自身需求在基本信息层面的直观表达,具有不同程度的感性因素,证据生成的过程是对多元需求信息基于公共立场的归纳和整合,从而尽可能排除信息不准确和规避治理主体的角色伦理冲突。证据的生成过程中秉持个体与集体,“小我”与“大我”之间的辩证统一理念,主体对证据使用和修正过程中,在主观上能够规训治理主体从个体的善转向具有共识性的善,从而导向个体与社会间合理利益关系的建构。循证治理中共识性的善不仅是一种自我的善,还是一种包容他人的善,他人的善不完全等同于利他主义,而是能够兼容他人价值观念的共识性的善,从而实现对共享公共利益的价值理性。

## 四、结语

回溯历史,在我国治理领域的历史进路中,从强政府弱社会的管理模式到多元主体参与的治理体

<sup>①</sup> EEF是2011年成立的一个致力于打破家庭收入与教育成就之间联系的独立慈善机构。该机构主要针对中小学教育,为各个家庭、学校以及领导者提供免费、独立和循证资源以支撑教育决策。该机构提供了有关如何提高儿童和青少年成就的发展证据的丰富图景,并发布评估报告,支持各个学校、家长深入了解学校数据,寻找差距,加强同类学校间的合作和学习。截止到2016年,EEF已在英国7200多所学校执行了数百个教育评估,以找到提高教学效果的最佳方式。相关材料参考英国教育基金会2015-2016年度报告 [https://educationendowmentfoundation.org.uk/public/files/Annual\\_Reports/EEF\\_Annual\\_Report\\_2015-16\\_-\\_print\\_version.PDF](https://educationendowmentfoundation.org.uk/public/files/Annual_Reports/EEF_Annual_Report_2015-16_-_print_version.PDF)。

制,其根本目的都是基于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为实现有序高效的善治而形成的社会建设方式。在我国改革发展的新时代,创新治理格局不可能再重复强政府弱社会的态势,也不可能照搬西方国家将治理工作完全转嫁给社会组织的治理体系。新时代下,随着社会交往关系的延展、公共领域空间的骤增,使社会治理的任务日益庞杂和繁重,多元主体的治理自觉已有不同程度的普遍提升。无论强政府的管理模式还是全盘社会组织化的治理形式,人民在治理中的主体地位都表现为一种自在性存在,难以规避治理中群众中的个体对政府或社会组织的绝对依附,造成治理过程中信息不畅、举证不足进而导致治理低效,决策失误等问题。新时代下以人为本、关注民生是社会治理工作的重点和根本价值旨归,治理格局的创新必然进一步走向“人民本位”的模式,因而“善治”不再单纯依附于单一的政府治理,而是逐步提升人民的主体地位和主体自主的权利。一方面政府在决策中需要人民的参与,人民提供最新有效的治理信息以备形成证据供决策参考;另一方面在人民生活需求日益得到满足之余需要公共性的回归以更好地实现自我和社会的协同发展。

新时代善治的理想状态是改变强政府治理模式下政府与社会二分的治理思维,从而以人民为中心构建政府、市场、社会相互协调、合作共赢的治理体制。在这一体制中,强有力的证据链是串联多元治理主体的必要体系,通过研究证据支撑治理措施的说服力。在社会结构日益复杂的背景下,治理主体的自主能力和举证意识越发重要。对此,我们可以将新时代的社会治理创新理解为政府与人民在以治理证据支撑的公共理性中协调努力的建设方式。将循证理念嵌入新时代的治理格局中,各主体根据治理证据分析治理意见,通过总结多条不同治理意见背后的证据关联,研究隐藏在多元治理意见中的治理问题和民生短板,进而针对研究证据所表明的问题有针对性地进行知证治理,以实现科学有效的善治。

#### 参考文献:

- [1] Rousseau D M. Is There Such a Thing as “Evidence - based Management”?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06, (2): 256 - 269.
- [2] 李 刚. 走向教育的循证治理[J]. *教育发展研究* 2015 (23): 26.
- [3] 俞可平. 论国家治理现代化[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
- [4] 费孝通. 乡土中国[M].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 2007.
- [5] 约翰·罗尔斯. 正义论[M]. 何怀宏, 等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 [6] 福克斯 米勒. 后现代公共行政——话语指向[M]. 楚艳红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0.
- [8] 颜士梅 梅丽珍. 循证管理中“证据”的内涵及测量[J]. *软科学* 2012 (11): 50.
-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 [10] 米歇尔·克罗齐耶. 法令不能改变社会[M]. 张 月译. 上海: 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 [11] 杨国荣. 你的权利, 我的义务——权利与义务问题上的视域转换与视域交融[J]. *哲学研究* 2015 (4): 53.
- [12] 康德全集(第4卷)[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 [13] 黑格尔. 法哲学原理[M]. 范 扬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2.
- [1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15] 马 亮. 行为科学与循证治理: 治国理政的创新之道[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16 (6): 10.
- [16] 曾 哲 周泽中. 多元主体联动合作的社会共治——以“枫桥经验”之基层治理实践为切入点[J]. *求实* 2018 (10): 42.
- [17] 黑格尔. 小逻辑[M]. 贺 麟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0.

(责任编辑: 余小江)